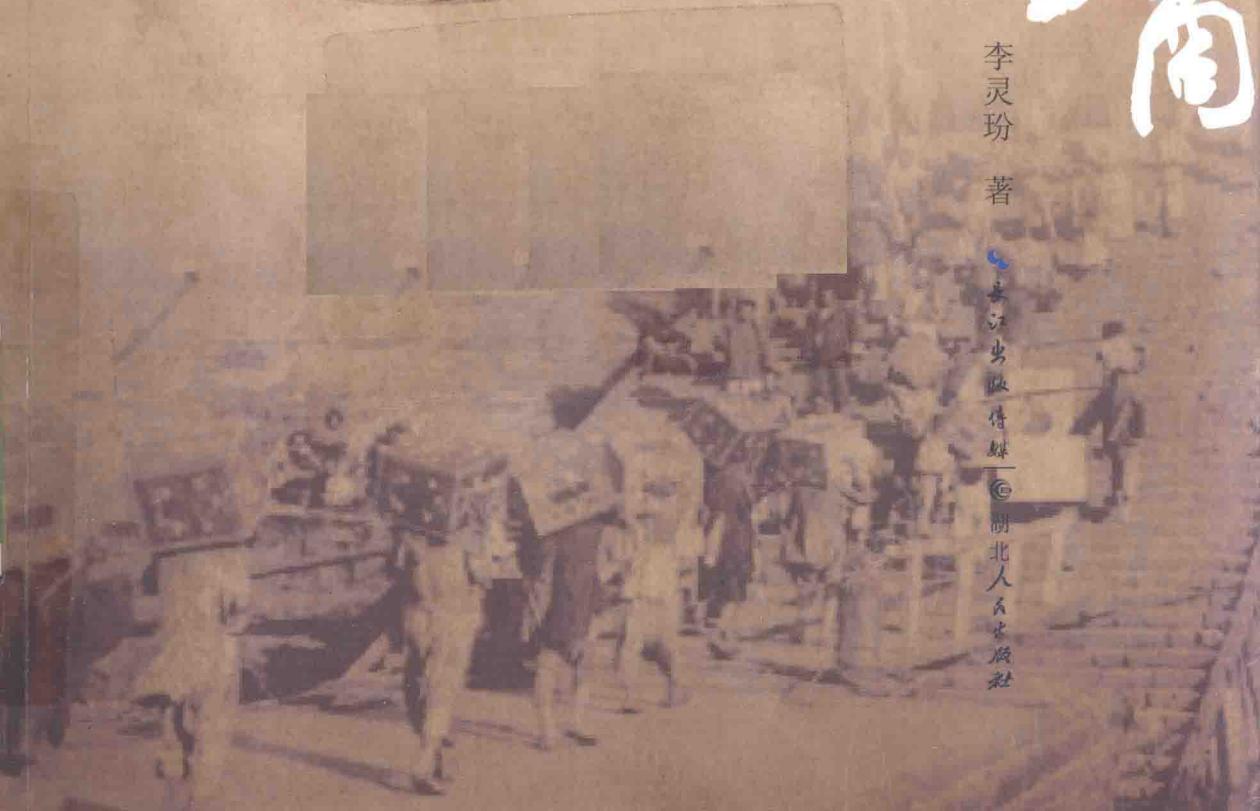


洞茶与洞商

李灵玲 著

《吴江蛊惑情缘》◎ 湖北人民出版社



李灵玢 著

洞茶与洞商

长江出版传媒
湖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洞茶与洞商 / 李灵玢著.

武汉 : 湖北人民出版社, 2014.12

ISBN 978-7-216-08075-0

I . 洞 … II . 李 … III . 商业史 — 研究 — 湖北省 — 清代

IV . F729.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43154号

出 品 人：袁定坤

责任部门：高等教育分社

责任编辑：傅爱民

封面设计：董 昶

责任校对：范承勇

责任印制：杜义平

法律顾问：王在刚

出版发行:湖北人民出版社

印刷:武汉中远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87毫米×1092毫米1/16

版次:2014年12月第1版

字数:232千字

书号:ISBN 978-7-216-08075-0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道268号

邮编:430070

印张:15.25

印次:2014年12月第1次印刷

插页:3

定价:38.00元

本社网址: <http://www.hbpp.com.cn>

本社旗舰店: <http://hbrcbs.tmall.com>

读者服务部电话: 027-87679656

投诉举报电话: 027-87679757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由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洞茶源流	1
一、茶乡羊楼洞	1
二、最好茶歌谷雨前	7
三、茶政、茶税与洞茶	10
四、清初茶政的开放	15
第二章 茶出洞乡	19
一、洞商创业	19
二、走向北方的洞茶	26
三、“大盛魁”与茶贸	30
四、晋商在洞镇	37
五、茶庄与茶行	43
第三章 洞商兴起	51
一、雷氏：生业与宗族	51
二、游氏：贸丝与业茶	71
三、饶氏：军户到茶商	78
四、黄氏：漕运和商贸	88
五、诸姓洞商	97
第四章 洞商·晋商	101
一、洞商与官匪兵	101
二、广建行屋的坐贾	115
三、洞茶万里行商路	118
四、茶商与儒学	128

洞茶与洞商

第五章 英伦茶红	134
一、英俄茶俗的影响	134
二、广东来的买办	139
三、汉口开埠与头茶竞买	144
四、红茶出洋	152
五、对英茶贸渐行渐远	157
第六章 俄商包茶	161
一、出手阔绰的买家	161
二、俄商中国通	166
三、垄断与包茶	170
四、俄商茶路	174
五、从加捐到减厘	177
六、王国的末日	192
第七章 香茶洞镇	194
一、茶业改进	194
二、行帮和商会	199
三、因茶而兴的行业	205
四、地方的变化	211
五、茶乡妇女	217
六、社会风气	226
七、茶乡阶层	231
八、衰落与重生	236
结语	239

第一章 洞茶源流

一、茶乡羊楼洞

要细说以业茶为主的洞商，必须先说及洞茶；而说到洞茶及其产业，又有必要先说说洞茶的产地——鄂南古镇羊楼洞。

羊楼洞又名羊楼峒，地处湖北南部边缘，南与湖南临湘县交界，其东南不远即是江西。行政上，羊楼洞隶属于咸宁赤壁市（原蒲圻县）。幕阜山脉西段延伸到此，逐渐陵夷为余脉，羊楼洞就处于山脉北麓。

据有关记载，此地“群峰岞崿，众壑奔流”^①，“四面环山，形如釜底”^②，其地形状“如仰盂”^③，而其地名的由来，皆由“四面多山，其形如洞，相传昔有牧者建楼于此，因而得名”^④。意思是羊楼洞四面环山，其地理形状像一口锅或一个口沿朝上的器皿，又相传有牧羊人在这里建筑过一座楼，所以这里就有了羊楼洞这个地名。然而这个地名来由的传说其实有些牵强。因为历史上很少有因周围多山的盆地地形而得名为“洞”的先例。更近情理的地名来由，也许还是应该从其地理位置和历史建制中去



图 1-1 旧时羊楼洞全景

① 康熙《蒲圻县志》卷一，山川。蒲圻张氏无倦斋写本。

② 戴啸洲：《湖北羊楼峒之茶业》，《国际贸易导报》第五卷第五期。

③ 道光《蒲圻县志》卷四，乡里。1975年台北成文出版社据道光十六年刻本影印。

④ 陈启华：《湖北羊楼峒区之茶业》，《中国实业》第二卷第一期，1936年1月15日。

寻觅。宋代旧制，羁縻州辖行政单位之大者称县，小者为峒。所谓“羁縻州”，指地处僻远，执政者如放风筝般牵线维系而不使脱落之地。宋代赵昇《朝野类要·羁縻》：“荆广川陕，溪洞诸蛮，及部落蕃夷受本朝官封而时有进贡者，本朝悉制为羁縻州。盖如汉唐置都护之类也。”说的就是这个意思。羊楼洞僻处史称荆蛮的湖北偏远边界之地，在鄂湘赣三省交界群山环抱之中，历史上又曾隶属于兴国州，所以其地应当是羁縻州辖行政单位之小者，所以称“峒”。宋代以后，作为行政建制之“峒”的意义逐渐不为时人所知，更为通俗的“洞”字取代“峒”字流行，所以人们对于羊楼洞地名的来历理解就产生了偏差。从历史上看，“洞”的大意指处于蛮荒的一片地方，与开化较早地方的“乡”、“镇”的意思相近。

羊楼洞地处北纬 29° — 30° ，受中亚热带季风气候控制，年平均实际日照时数为1200—2200小时，日照率在25%—50%之间，太阳辐射年总量为85—114千卡每平方厘米，年平均气温达 16.5°C — 17°C ，日平均气温 $\geq 10^{\circ}\text{C}$ 的积温为 5100°C — 5300°C ，无霜期230—300天，年降水量为1300—1600毫米，日照充足，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光热同期，雨热同季。由于茶树为亚热带和热带多年生植物，喜湿润、光照，忌渍水，要求冬季不严寒，夏季不酷热，冬季月平均温度 7°C ，夏季均温不超过 32°C ，年均温度在 13°C — 18°C 之间，年降雨量1000毫米以上，所以羊楼洞地区有比较适宜于茶树生长的气候。羊楼洞地处鄂南湘北山区，周围数县，地势自东南向西北倾斜，多低山、丘陵、岗地，多缓坡，山区岭谷相间，丘陵平地杂错，矮山罗列，多在海拔200—400米之间，历来有“七山一水二分田”之说；土壤多酸性红壤和黄壤，富含游离铝铁。这种坡地土壤，排水便利，不太适宜于南方许多常见植物（如水稻）生长，但是却适宜于要求酸性土壤的茶树、楠竹、杉树等林特产植物的生长。所以自古以来，羊楼洞地区就已种植茶树，出产茶叶。

湖北地区关于制茶饮茶的记载非常早，三国时张揖《广雅》记载：“荆巴间采叶作饼，叶老者，饼成以米膏出之。欲煮茗饮，先炙令赤色，捣末，置瓷器中，以汤浇覆之，用葱、姜、橘子芼之。其饮醒酒，令人不眠。”^①说的就是湖北地区出产可以醒酒提神的茶叶，只是当时喝茶，习惯加入葱、

^① 见陆羽：《茶经》卷下，七之事。



姜和橘子等东西。

鄂南地区植茶的历史亦可追述至三国时期。据传，东汉三国时东吴士燮早年曾得仙人密传，以奇物异果养生，他曾于汉献帝十五年任武昌太守，在羊楼洞地区教人民植茶饮茶。而赤壁之战时，庞统据说也曾隐居于这一带植茶。^①羊楼洞地区的茶事最早见于典籍，应当为晋代陶潜《续搜神记》：“晋武帝时，宣城人秦精，常入武昌山采茗，遇一毛人，长丈余，引精至山下，示以丛茗而去。”^②在陶潜生活的晋代，武昌郡下辖七县，今羊楼洞及其周围数县皆属，而多山之处，只有羊楼洞所属横亘今咸宁之赤壁、通山、崇阳等地的幕阜山脉，所以那个有一丈多高的毛人指引秦精看茶的地方，应当就在今天羊楼洞茶区所涵盖的鄂南这一带。《续搜神记》所载虽涉怪诞，但同为晋代或稍晚文献的《桐君录》关于“西阳、武昌、庐江、晋陵好茗，多东人所作清茗”的记载^③，亦可作武昌郡自晋代即有茶事之佐证。更早，《三国志·韦曜传》载韦曜好饮茶而不能酒，而吴主孙皓好酒，常大宴群臣作竟日饮，每人以七升为限，而韦曜仅有两升酒量，孙皓或专门为他酌减限量，并且让他用饮茶代替喝酒，由此而有了“以茶代酒”的成语。韦曜曾来赤壁，并留下著名的《伐乌林赋》。他的嗜茶，也可为三国时属于赤壁地区的羊楼洞早有茶事的文献佐证。近代出土的大量文物也可证实羊楼洞地区茶事始于东汉三国时期。如1973年在距羊楼洞不远的新店出土的青瓷贴花小碗，据蒋赞初先生考证当为饮茶具，是东汉至三国时东吴的文物。1998年在赤壁出土的大量东汉至东吴的青瓷器皿，其中一四



图 1-2 晚清羊楼洞地区的茶园

^① 冯金平《赤壁茶与茶马古道》，兰州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页。

^② 见陆羽：《茶经》卷下，七之事。

^③ 见陆羽：《茶经》卷下，七之事。

系罐也被考证为茶具。^①

茶古谓之“荼”，饮之有百益而无一害。古传神农氏尝百草中毒，以饮荼解之。《诗经·氓》有“谁谓荼苦，其甘如饴”的记载。《尔雅·释木》：“槚，苦荼。”郭璞注：“树小似栀子，冬生叶，可煮作羹饮。今呼早采者为荼，晚采者为茗。一名旃，蜀人名之曰苦荼。”由此我们知道，古代“荼”也写作“槚”，又名“苦荼”，晚采的茶还有个“茗”的异名，而且古人喝茶是放在火上煮的。汉代《神农食经》和《华佗食论》指出饮茶令人有力，悦志。^②唐代《新修本草》则指出饮茶能消宿食，《本草拾遗》指出茶有易于健康，“久食能令人瘦”。李时珍《本草纲目》更是条列饮茶降火祛病的药效，推崇备至。而五代蜀毛文锡《茶谱》中更特别指出羊楼洞所在的“鄂州东山、蒲圻、唐年县皆产茶，黑色，如韭，叶极软，治头痛”。

饮茶之风，自唐甚极。《旧唐书·李珏传》曾记载：“茶为食物，无异米盐，于人所资，远近同俗。既祛竭乏，难舍斯须，田间之间，嗜好尤切。”指出当时茶已经与米盐一样同为生活之必需品，而且无论远近，深入民间，人们一刻也离不开它。唐人《封氏闻见记·饮茶》也记载当时饮茶风气之盛：“古入亦饮茶耳，但不如今人溺之甚：穷日尽夜，殆成风俗，始自中地，流于塞外。”而在羊楼洞地区，民间种茶饮茶之俗亦源远流长，到宋代以后极盛，甚至于一度出现“民不务耕织，唯以植茶为业”，乃至须崇阳县令张咏下令“拔茶植桑”以为农民规避过重之茶税的现象。^③清代《蒲圻县志》载当地嘉庆贡生周顺卿所作《莼川竹枝词》这样描述当年农家清明前采茶的情形：

三月春风剪嫩芽，村中少妇解当家，残灯未掩黄粱熟，枕畔呼郎起采茶。^④

光绪年间崇阳人傅燮鼎也作诗记述鄂南地区的采茶盛况：

山女提篮逐野花，村农打鼓跃池蛙。溪南溪北歌声答，半是分

① 冯金平《赤壁茶与茶马古道》，兰州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页。

② 见陆羽：《茶经》卷下，七之事。

③ 宋·沈括：《梦溪笔谈》卷二。又张咏：《乖崖集》附录《忠定公遗事》：“民以茶为业，公曰：‘茶利厚，官将榷之，不若早自刈也。’命拔茶而植桑，民以为苦。其后榷茶，他县皆失业，而崇阳之桑皆已成，其为绢而北者，岁百万匹，其富至今。”

④ 道光《蒲圻县志·风俗》。



秧半采茶。^①

可见在山区茶农们采茶时有歌声相伴且唱答，心情轻松而愉悦的。

洞乡古代的茶俗因资料欠缺已难以考实，从今天田野采风的收获来看，茶在羊楼洞地区的民俗中，确是各种重要场合所不可缺少的物品。

在婚俗中，茶是不可缺少的彩礼，以至于称彩礼为“茶礼”。明代郎瑛《七修类稿》：“种茶下籽，不可移植，移植则不可复生也；故女子受聘，谓之吃茶。又聘以茶为礼者，见其从一之义也。”因为“茶性最洁”，可以代表纯洁的爱情；“茶不移本”，可以代表爱情的坚贞；“茶树多籽”，可以祝福新人多子多孙，种姓延绵长久，所以茶为男婚女嫁所必备。这种风俗在羊楼洞地区延续至今。婚茶程序从吃订婚茶开始，新娘喝了男方订婚茶，受了男方茶礼，就表明婚约已成，故民间有“一家女不喝两家茶”的俗谚。结婚之日，婚礼参与者先要喝男方送来的“启节茶”，以示婚礼启动之意；再装女方的“陪嫁茶”或“郎舅茶”。婚礼之时，先饮“同心茶”，新人交杯喝糖茶，意寓“茶男茶女，成双成对，红糖冲茶，多滋多味”^②，拜堂行礼后，再喝“敬老茶”，以茶认公婆、认长辈。之后，再沏“迎宾茶”，意在考察新娘的泡茶功夫，能干与否。洞房之时，行“闹茶抬茶”，三天无大小，以求通过闹茶，“人发大财，茶发新芽”。而婚期过后，新娘还要请全村妇女喝“结伙茶”，其礼为大锅煮茶，大碗喝茶，边吃边喝，饱足为止，过程之中，参加喝茶的妇女们一人一支筷子，以示吃喝“不需太快”，新娘从此加入全村妇女行列，成为日后同伴^③。

茶在羊楼洞地区土葬时期的民俗中，亦曾是丧祭之礼不可或缺之物。人死后，在停尸床前先要供上一盅清茶。入殓前要“含茶”，在死者口中放进一片茶叶和几粒米，意味着死者在另一世界仍有吃有喝。入棺之后，在灵堂香案前再供上一盅清茶。成殓后，主家烧茶，主人和客人自斟自饮，互不敬茶。

^① 傅燮鼎：《崇质堂诗》卷九，《溪上杂咏》之二。

^② 陈旺林：《鄂南婚茶》，《文化月刊》1998年（11）。

^③ 狄英杰：《近代湖北羊楼洞茶业经济与文化研究》，华中农业大学硕士论文，2011年。

奔丧者与治丧抬灵者进门首餐，只吃“素茶”^①，而下葬时，长者执引路幡开路，边走边要撒“引路茶”。灵柩上山，途中要歇息一次，抬柩者休息喝茶，谓之“板凳茶”。棺木入土前，要敬茶焚香烧纸。入土后，孝子齐跪墓前，司丧边念祝词边把盘中茶叶和米撒向孝子，孝子双手牵孝衣接茶接米，称“赐福茶”。埋葬之后，众客散去，抬棺八仙返回主家吃酒饭，称为吃“回丧茶”^②。七祭奠亡，供品均以茶为先，供后沿坟洒掉，谓之“献茶”。若五七的第七日与当月的“七”日重合不利，解除之法为子孙挨家乞讨“百家茶”^③。清明或七月十五祭扫，供上茶水和果饼，祭毕，茶水献给神灵，果饼带回给孩子。大年初一，同族祭祖，除酒以外，以茶为先。善男信女，祭天谢地，常用“清茶四果”或“三茶六酒”^④。茶在祭祀之中成为圣物。

在羊楼洞地区，还时兴祭祀茶王，人们对古老高大的茶树顶礼膜拜。茶庄开庄时要拜茶架，称为“拜架”。砖茶起运前要拜茶堆，称为“拜官堆”。茶叶开采前要选少女开山，开山之后，还要“打吊结幡”，祈求茶叶丰收。^⑤在旧时蒲圻，若家人生病，则时兴半夜焚香拜茶神以求平安，谓之“说情茶”^⑥。过年过节，更离不开茶。过年大年初一，全家要喝上一杯团圆茶，晚辈要向长辈敬茶。咸宁地区自明代流传有才女钱六姐《拜年谣》，其词云：“父母大人，福寿安宁，敬茶一杯，四季清平。”^⑦饮茶代表了祝福。过年从正月初一到十五到各家吃摆茶，叫“吃年茶”。年茶吃不完剩下，寓意年年有余；喝剩的残茶在过年期间内不能倒掉，寓意积财。逢端午节中秋节，要“吃节茶”，俗以糖茶佐以糕饼，或以糖茶加入荫饭干炒米，边吃茶边叙情。清代嘉庆、

① 牛达兴、雷友山、黄祖生、高章林：《湖北文化大观》，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年，第77—78页。

② 万献初、宗嵩山：《鄂南茶文化》，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

③ 牛达兴、雷友山、黄祖生、高章林：《湖北文化大观》，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年，第107—108页。

④ 姚国坤：《文化概论》，浙江摄影出版社2004年，第154—159页。

⑤ 万献初、宗嵩山：《鄂南茶文化》，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

⑥ 狄英杰：《近代湖北羊楼洞茶业经济与文化研究》，华中农业大学硕士论文，2011年。

⑦ 咸宁市民间文学集成领导小组：《中国民间歌谣集成·湖北卷·咸宁地区歌谣集》，中国民间文学出版社1990年，第103—105页。

道光时期湖北蒲圻诗人戴玉华描写当地客来吃茶乡情的诗歌这样写道：

炊无曲突食无盘，薰荐当床睡卧安。客到不分男女辈，火池茶罐坐成团。^①

一家主客无男女之别，一起围着火塘和热气腾腾的茶罐坐话饮茶，其乐融融，让一直浸润礼法的诗人都不禁心生羡慕之情。凡此种种，皆为茶区人民优良且独特的茶文化。

这种与民众生活关系密切的文化生态，反映了羊楼洞地区因长期植茶、售茶、制茶、饮茶对自然经济状态下民俗的深刻影响，值得记述和研究。

二、最好茶歌谷雨前

羊楼洞地区出产好茶。清代著名文人袁枚曾因获赠羊楼洞松峰山（又称芙蓉山）所产旗枪茶而作诗咏之曰：

“四银瓶锁碧云英，雨前旗枪最有名。嫩绿忍将茗碗试，清香先向齿牙生。”（《谢南浦太守赠芙蓉汗衫雨前茶》）

相传公元 628 年，唐太和年间，洞茶就因朝廷喜爱而被定为贡品。^②《清史稿·食货志》记载明清两朝的茶法：“明时茶法有三：曰官茶，储边易马；曰商茶，给引征课；曰贡茶，则上用也。清因之，于陕、甘易番马。”明确地指出贡茶是为皇帝食用的精品茶。由于贡茶为中国古代专门进献皇室及中央官员享用的茶叶，对品质要求苛刻，迫使地方制茶技术不断改进，茶叶质量不断提高，进一步促进了茶业的发展。宋代马端临《文献通考》将羊楼洞地区出产的进宝、双胜等列为片茶名品，把白毛毛尖、桃花绝品和碧云凤髓列为三大名散茶^③。著名文学家苏轼曾专程到羊楼洞名茶桃花绝品产地桃花寺，向长老索要桃花茶种带回黄州种植，并写下千古流传的诗篇《乞茶栽雪堂诗》，其中有“不令寸土闲，更乞茶子艺”的诗句，至今仍见于《东坡集》。明代黄一正《事物绀珠》将以羊楼洞为中心的崇阳、嘉鱼、蒲圻地区所产茶

^① 清·戴玉华：《西林诗萃·俚言八首》之八。

^② 杨波：《洞茶之乡羊楼洞》，《蒲圻文史》第二辑，蒲圻市政协蒲圻文史委员会，1986 年。

^③ 万献初、宗嵩山：《鄂南茶文化》，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第 108 页。

列为名茶。^①清代学者查正行则在《海记》一书中记载羊楼洞所在的武昌府为贡茶地，湖广总督张之洞更在历数清代各地向朝廷各种贡物之后，对于湖北特产记载有“湖北贡茶、笋、艾、葛之属”。^②《清会典》也载有“湖广岁贡茶芽二百斛，武昌兴国州六十斛”^③。羊楼洞旧属武昌兴国州，所记“岁贡茶芽”，原料为茶树于每年清明谷雨之前所萌极嫩多汁的芽叶，当即前所述周顺卿《莼川竹枝词》所歌善当家的村中少妇呼郎早起所采之“三月春风剪嫩芽”，而另一位清代诗人罗厚瀛在其所作《咸宁竹枝词》中也这样描写：

□屋青帘百户烟，金山山下有温泉。东关楼阁西河市，最好茶
歌谷雨前。^④

鄂南名茶，让多少爱茶的诗人墨客留下无尽的吟唱。

洞茶成为流通区外的商品，与唐宋元茶法制度有关，更与我国少数民族地区茶俗兴起有关。

唐人封演《封氏闻见记》记载饮茶之俗起自南方，北方的茶俗起自佛教，因为和尚坐禅提神，于是喝茶，由僧及俗，到处煮饮，又由中原传至塞外，以至于胡人为得到茶叶，赶了很多马匹来交换，开茶马互市的先例。^⑤而史载唐德宗建中年间（780—783年），中唐使者出使到西藏，煮茶时被西藏最高统治者赞普见到问及，使者回答说煮的是能够“涤烦疗渴”的茶，因而引起赞普向使者炫耀自己所藏的茶品，赞普藏品所列产地，有寿州、舒州、顾渚、

① 湖北省志贸易志编辑室：《湖北近代经济贸易史料选辑》第二辑，湖北省志贸易志编辑室 1984 年。

② 张之洞：《劝学篇·内篇·教忠第二》，两湖书院光绪戊戌刊本。

③ 庄晚芳：《中国茶史散论》，北京科学出版社 1988。

④ 清·罗厚瀛：《怡春阁诗草》卷四，《咸宁竹枝词》四首之一。

⑤ 封演：《封氏闻见记·饮茶》：“茶，早采者为茶，晚采者为茗。《本草》云：止渴，令人不眠。南人好饮之，北人初不多饮。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恃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起自邹、齐、沧、棣，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于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始自中地，流于塞外。往年回鹘入朝，大驱名马，市茶而归，亦足怪焉。”

蕲门、昌明、灊湖等等，^①说明不仅西北回鹘，即便西藏吐蕃的统治者，对于产于中原的茶叶也都具有丰富知识，不仅储品丰富，而且能够如数家珍般地说出茶叶的具体产地，所述虽然仅涉及吐蕃上层贵族，其藏品大概也多为上品名茶而非普遍用于互市的官茶商茶，但也可以部分地说明饮茶风俗向中原周边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已经无远弗届。

饮茶风俗的普及推广，带来了茶叶交易的蓬勃兴盛。唐代诗

人白居易就曾在其名篇《琵琶行》中留下“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的诗句，涉及当时盛产茶叶的江西浮梁地区和贩茶商人。著名政治家诗人杜牧也记述每年采茶季节，商人们带着家眷和各种锦绣首饰，穿着华丽的衣裳进山买茶的热闹情景。^②而《封氏闻见记》则记载当时商人所收购，“其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色类甚多”。这种车船络绎不绝运载“所在山积”茶叶的量具体有多少？由于时代久远，文献不足，无法统计出具体数额，但据唐宪宗时《郡县志》记载，唐玄宗天宝元年（724年），仅浮梁一县茶叶年产量就达700万驮。^③而据杨晔《膳夫经手录》对于新安茶收获量每年达“数百万斤”的粗略统计，也可以窥见当时茶产量之一斑。据杨晔所述：“新安茶，蜀茶也，与蒙顶不远，但多而不精。”如此质量不甚高的茶叶收获量都能如此巨大，其他可想而知。学者方键认为，唐代全国茶叶每年总产



图 1-3 古画中的茶棚

^① 《唐国史补》卷下：“常鲁公使西蕃，烹茶帐中。赞普问曰：‘此为何物？’鲁公曰：‘涤烦疗渴，所谓茶也。’赞普曰：‘我此亦有。’遂命出之，以指曰：‘此寿州者，此舒州者，此顾渚者，此蕲门者，此昌明者，此灊湖者。’”

^② 杜牧：《上李太尉论江贼书》：“四远商人皆将锦绣缯纁金钗银钏，入山交易；妇人稚子，尽衣华服，吏见不问，人见不惊。”见《全唐文》七五一。

^③ 陈椽：《茶叶通史》，农业出版社2008年，第56—57页。

量达 2000 万斤至 4000 万斤之间，^①而有学者甚至认为唐代茶叶年产量约为 1 亿斤。^②在产量丰富的同时，茶叶价格也颇高，杨晔《膳夫经手录》载，其时精品茶“蒙顶”价格高至“束帛不能易一斤先春蒙顶”，而其时羊楼洞地区所产精品贡茶，想必价格也与此相当。宋朝关于湖北地区茶业的记载相对比较具体。沈括《梦溪笔谈》十二卷载：嘉祐六年（1061 年），汉阳军受纳鄂州片茶 238300.5 斤。据清代徐松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宋会要辑稿·食货》记载，北宋中期湖北地区州军买茶场收购当地所产茶叶数量，兴国军为 5297360 斤，鄂州为 363135 斤。^③羊楼洞所在的湖北鄂州兴国军茶产区购茶达数百万斤之数，足见其种植普及之广、参与全国贸易之深。

三、茶政、茶税与洞茶

与茶俗普及传播同步，茶税以及茶叶专卖制度也开始出现。这不仅是因为茶叶具有高额的商业利润、是民族贸易的重要商品，而且由于茶马互市之后，茶叶贸易关系冷兵器时代的重要战略物资——马匹的进口，中央政府高度重视，加以严格控制，也就是必然的了。

茶税之议，始于唐德宗建中三年（782 年），诸道盐铁使张滂奏立茶法，规定茶与竹木漆一样，征收交易额 10%，即分“三等时估，每十税一”，充作两税。贞元九年（793 年）正月“初税茶”，茶税总量就达到每年 40 万贯，这是唐代茶税独立计征、分等计价、按值征收的开始，“茶之有税，自此始也”。^④

长庆年间（821—824 年），茶税税率由 10% 提高到 15%，且按量计征，于应征税数量之外，更以弥补损耗的名义另加斤两。唐文宗太和九年（835 年），曾短暂改税为榷，实行彻底的茶叶专卖，规定从茶树种植、茶叶采集加工直至销售，均由政府统一经营。之后由于种种不便，仍回归茶税。唐武宗始，由于战争需要，茶税提高到近乎横征暴敛的程度，岁入由 40 万贯到懿宗大中

① 方健：《唐宋茶产地和产量考》，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2）。

② 陈椽：《茶业通史》，农业出版社 2008 年，第 56—57 页。

③ 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卷二十九，六一七。

④ 《旧唐书·德宗纪》下，《旧唐书·食货志》下、《新唐书·食货志》四。



元年（859年）的60万贯，更到文宗太和年间（827—835年）的100万贯，陈衍德先生据唐代大中年间茶利收入603370贯之数，指出其占中央财政收入的3.92%。^①孤立地看，似乎占比并不很高，但考虑到茶叶为单项作物，且产地较集中，例如仅浮梁一县“每岁出茶七百万驮，税十五余万贯”，所谓全国各地全年矿产税收还“不能当一县之茶税”，其沉重可见一斑。而茶农和商家不堪重负，走私问题也日渐突出。

宋代茶法，实行“榷茶”即茶叶专卖，宋太祖乾德二年（964年），“令民折茶税外，悉官买，民敢藏匿而不送官及私鬻者，没入之。”^②《宋史·食货志》记载明代在江陵府、真州、海州、汉阳军、无为军、蕲州蕲口设6个榷货务。在蕲、黄、庐、舒、光、寿6州设立13个山场，垄断茶叶贸易。有学者认为这“表明北宋销西北的茶叶中，包括湖北、安徽、河南和江苏出产的茶叶”，而且“江南茶1027万斤，两浙279000余斤，荆湖247万余斤，福建393000余斤，皆送到6榷货务出卖”。^③设置榷货务和榷茶场，垄断贸易，严刑峻法，禁止走私，的确是榷茶制度在宋代实行之始。

到太宗淳化三年，改行“贴射法”，允许商人直接与茶农在茶园交易。实行“贴射法”的结果是大量利润流入大商人腰包，而富商大贾垄断茶价，以次充好，政府税收流失，消费者怨声载道。到淳化四年，又不得不恢复六榷货务，以“交引法”代替“贴射法”。商人将政府所急需的粮草等军需物资运至国防所需的边地，由政府发放票据性质的“交引”，商人再凭交引到榷货务领取酬劳，酬劳之中，约三分之一为可以对少数民族地区营销的茶叶。“交引法”的实行是因为西北战事需要大量战争物资，而其实行结果是资本金越多获利越大，对大商人有利而对茶农和小商人不利，实行不久即弊端显现，到仁宗天圣元年，又改“交引法”为“通商法”。之后又多次调整，在允许商人直接与茶农交易的同时，加强对茶农的控制，包括对茶农的户籍控制，对茶园数量与茶叶质量的记录等等。这些措施，是实际上的茶叶专卖，结果只是加强了对于茶业的盘剥，而政府增加获利。据统计，在北宋

^① 陈衍德：《唐代专卖收入初探》，《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1）。

^②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乾德二年八月辛酉条。

^③ 陈椽：《茶业通史》，农业出版社2008年，第384页。

政和年间最后一次修改茶法之后的四年中，政府获利达 1000 多万缗，全国增收茶叶达 1280 多万斤。有学者据南宋数据认为：“宋高宗末年财政总收入为五千九百四十余万贯，宋孝宗时为六千五百三十余万贯。而这两代的茶利，分别占财政总收入的百分之四点六和七点二。”^①但从有关湖北的资料看来，由于税赋加重，羊楼洞茶区的茶业反而出现倒退。据宋王得臣《麈史》记载，“六路租茶通商以来，岁计三十三万八千六十八贯有奇，湖北独当十万二千三百三十一贯有奇，而鄂一州所敛，无虑三万九千缗。诸邑之中，咸宁又独重”。这说的是湖北尤其羊楼洞所在的咸宁地区茶产税赋繁重。繁重的税赋，造成了上节所述崇阳县令张咏为农民规避过重之茶税而下令“拔茶植桑”现象，而经改茶法之后，“民鉴他县，思公之惠，立庙以报之”。^②由于茶税沉重，人民竟以张咏拔茶令为惠民之事，的确有些匪夷所思，而据《宋会要辑稿·食货》之《乾道会要》记载：宋孝宗乾道年间（1165—1173 年），湖北兴国军永兴、通山产茶 647160 斤，鄂州蒲圻、崇阳、咸宁、嘉鱼等县产茶 177240 斤。这仅仅数十万斤的出产，较上节所述北宋前期该两地数百万斤茶产的记载，有大幅度的下降，应当真实地反映了当时过重茶税所导致的对茶业生产力的打击。由此看来，所谓茶叶增收，政府获利增加，可能只是因价格变动或专卖严格所带来的政府收茶层面的表象增长而已。

元代的茶法，史称“由约而博，大率因宋之旧而为之制焉”，^③认为只是更加细密和增大范围，主要办法与宋代一致。但仔细推敲，元代茶法与唐宋有根本的不同。突出的一点，就是取消茶马互市，实行定量销售执照性质的“引票制”。具体办法为向欲经营茶叶的商人收钞发放引票，引票分长短引，其中“长引”每引准销茶 120 斤，政府收银钞 5 钱 4 分 2 厘 8 毫；“短引”每引准销茶 90 斤，政府收银钞 4 钱 2 分 8 厘。自至元十三年（1276 年）实行，当年计征茶税钞 12000 多两，约折合茶叶 370 万余斤。^④可见，该制度中的“引票”与宋代茶法中的“交引”仅仅字面相似而实质完全不同，商人纳银取引销茶，政府收税给引准售，中间购置、贩运等环节放开，对于茶

① 漆侠：《宋代经济史》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8，第 802 页。

② 宋·沈括：《梦溪笔谈》卷二。

③ 《元史·食货志》。

④ 陈椽：《茶叶通史》，农业出版社 2008 年，第 68 页。